

孔 丘

孔丘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他生活在春秋末期。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度，他奔走呼号了一生，他处处碰壁，终生失意。晚年不得已退而授徒、著书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。他的言论，由其再传弟子，于战国初年编辑起来，称作《论语》。

孔丘生前，虽然备受社会和时代的冷遇，而在身后，他却异常“显赫”起来。他的学说，略加改造，就逐渐为封建阶级所接受。自从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孔丘为代表的儒学，便被改造为封建大一统的王权和神权紧相结合的儒学，孔子也就被涂上封建阶级的脂粉，成为他们所尊奉的偶像。此后，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，孔子学说屡经加工改造，孔丘的形象也屡经哄抬提高；权势者们利用他的名字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利用他的思想学说，作为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。于是，这位先秦时代的学者、思想家，便成为身着封建阶级袈裟的教主，而他的学说，也成为由封建阶级任意解说的宗教教条，在社会各个领域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直到“五四”运动，孔丘的传统尊严才受到革命的冲击；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孔丘的本来面目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。

显然，孔丘并不是一个文学家。但是，他却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人物。他的言论录《论语》，是一部语

录体散文。其中记述孔丘及其门人活动的文字，往往能写出人物的音容笑貌，表现人物的性格，从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。而且，《论语》的思想、语言，以及孔丘关于文艺的观点，对后来历代文学家都产生过重大影响。

一 没落的贵族后裔

孔丘，字仲尼，于周灵王二十一年、鲁襄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551年）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（今山东曲阜）。先代是殷商贵族后裔，属微子（商纣王庶兄）的嫡亲血系，世为宋国上层贵族。其远祖弗父何，曾是宋国的嗣君，把国位让给了弟弟；正考父在整理古代文献上，曾有过贡献。（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）其六世祖孔父嘉，在宋国内乱中为华督所杀，防叔奔鲁（服虔《后汉书·孔融传注》），始为鲁人。凌迟至于孔丘的父亲叔梁纥（或称孔纥，此从《史记》），只做过鲁国的封人（下级武官），已经破落了。而孔丘三岁，叔梁纥又死掉了，孔氏家族更加急剧地沦落下去。因此，孔丘少时“贫且贱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为了谋生，他不得不去学习某些技艺，去从事某些并非“君子”（贵族）所应该从事的职业，如为季氏管理仓库（委吏），管理牛羊（乘田）。对此，他自己一点也不隐讳，曾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，此下凡引《论语》，只注篇名）这说明，孔丘自幼年即已失去贵族的地位。但他的家世，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，仍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。

二 大变动的时代

孔氏家族的沦落，在当时并不是偶然现象，它不过是被时代急流冲刷下去的一个小小浮沤而已。

孔丘生活的春秋末期，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。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奴隶制逐渐解体，封建制逐渐萌生；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，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。这种变化，表现为奴隶主贵族阶级内部的分化，以及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残暴统治的斗争。

春秋时代，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，和牛耕技术的进一步推广，荒田得到大量垦殖，耕地面积迅速扩大。如春秋初年，晋国的“南鄙之田”，还是“狐狸所居，豺狼所嗥”的地方，不久之后，这个地区便开垦为良田沃壤。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革，农田水利的兴修，耕地面积不断扩大，农业产量不断提高，因而使私田大量出现。奴隶制时代所谓“天下为公”，土地全部属于奴隶主国家所有，是所谓“公田”。周天子有权处置这些公田，如封赠给各国诸侯、卿、大夫等等。但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土地私有成为普遍现象，一些奴隶主贵族想在公田上确立自己的私有权，因而周天子与各国诸侯之间，诸侯国内部诸侯与卿大夫之间，争夺公田的斗争就日益加剧。如周桓王八年（公元前712年），桓王取田于郑之后，就以王畿之内苏忿生之田作为交换条件。（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）周灵王九年（公元前563年），由于郑国执政子驷侵占了司氏、堵氏、侯氏、子师氏等贵族的土地，他们便联合起来，发动武装叛乱，杀掉了子驷。（《左传·襄公十年》）土地私有制的发展，促使奴隶主

贵族内部发生了分化：一部分人抱残守缺，死抱着奴隶制的“礼治”不放；一部分人则逐渐转化为新兴封建制的代表人物。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，也逐渐明朗化、尖锐化。如周简王十二年（公元前574年），晋厉公在旧贵族栾氏的支持下，用武力消灭了郤氏（《左传·成公十七年》）；过了二十几年，新势力联合起来进行反攻，于周灵王二十二年（公元前550年）打垮了栾氏。栾氏战败后，逃到了齐国，后来又悄悄潜回晋国，在他的封地曲沃，重新兴兵讨伐新势力。代表新势力的赵、魏、韩三家，联合拥持晋公，占据了公宫，击败了栾氏的反扑。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）从此赵、魏、韩三家把持了晋国的政权，并最后三分晋国，建立了封建制的赵、魏、韩三国。面对旧贵族的日益陵迟，守旧的叔向曾感慨地说：“栾、郤、胥、原、狐、续、庆、伯，降在皂隶，政在家门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）这时，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共主，诸侯国各自为政；各诸侯国内，政在大夫，宗周旧制已失去约束力，奴隶制的统治基础动摇了。

东方的鲁国，同样如此。春秋初年受封的叔孙、季孙、孟孙三家，到春秋后期，他们都拥有大量私田，有大批“隐民”（贵族隐蔽户口的一部分农民），有私人武装“甲七千”，力量远远超过公室。鲁宣公十五年（公元前594年），实行“初税亩”，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收税。但三家对普遍收税不满，在襄公十一年（公元前562年），三家对公室进行反击，“作三军，三分公室，而各取其一。”（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）到了昭公五年（公元前537年），三家又调整了相互的分地，“四分公室”，季氏独占二份，其他两家各得一份。从此，三家都采用了征税制。因此，以季孙氏为首的三家新势力，

与公室为首的旧贵族，斗争日益加剧。鲁昭公曾企图依靠旧贵族，夺回三家权力，但却被他们所击败，流寓在齐国边境之上，到死未能回国。作为宗周的一个重要基地的鲁国公族，此时也风雨飘摇，气息奄奄了。

孔丘在这一社会变动中，他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保守的，“亲周”“据鲁”，是他一生坚持的原则。他认为应该维护周天子的正统威信，应该恢复奴隶制的“君君臣臣”的传统秩序，即恢复旧的礼治。他对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、“陪臣执国命”、“政在大夫”的现状，极为不满（见《季氏》），他希望能出现一个“天下有道”的统一局面。他曾说：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（《八佾》）“从周”，似乎就是孔子为自己确定的政治方向。

要“从周”，从哪里做起呢？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（《雍也》）最理想的地方，就是“父母之邦”的鲁国。鲁国原为周公之子伯禽的封邑，曾是奴隶制文化的中心，保有宗周的典籍和文物制度。昭公二年（公元前540年），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，见到易象和春秋，便赞叹道：“周礼尽在鲁矣！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）但是，在鲁国，“禄之去公室，五世矣；政逮于大夫，四世矣；故三桓之子孙微矣”（《季氏》）了。从鲁国的现状，他不难推想，整个奴隶制的颓运，如江河日下，已难挽回了，但他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（《宪问》），他要通过他的教育活动，来挽回世道人心；通过他的政治活动，维系奴隶制于不坠。

孔丘是“圣之时者”，从鲁国及各诸侯国的政治现状，他认识到完全恢复原有的制度，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他虽然主张维护周天子的正统地位，但并不主张要把时代拉回丰镐时期的宗周旧制，而是在某种程度上，赞成一些必要的改革。这从他对

子产的评价上，可以看得出来。

子产是春秋时代郑国著名政治家。他在郑国执政期间，于周景王二年（公元前543年），实行了一些社会改革“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。大人之忠俭者，从而与之；泰侈者，因而毙之。”（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）并“开亩树桑”，承认个体农民的合法性，而按什伍加以编制；同时采取一些措施，限制旧贵族势力。昭公四年（公元前538年），子产又作“丘赋”，在承认个体农民合法性的基础上，又给予他们一部分人以作甲士的资格，打破了以往甲士的身分限制。昭公六年（公元前536年），子产铸刑书，将法律公之于众。这引起了保守主义者的恐慌。晋国叔向把子产一系列的改革，都看作是大逆不道，他说：“今吾子相郑国，作封洫，立谤政，制参辟，铸刑书，将以靖民，不亦难乎？”认为是郑国将亡的征兆（《左传·昭公六年》），子产却很坚定，他认为采取那些改革措施，是必要的，是为了“救世”。（同上）孔丘对子产十分敬仰，“及子产卒，仲尼闻之，出涕曰：‘古之遗爱也’。”

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一年》）《论语》里也记载着这样的话：“子谓子产，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”（《公冶长》）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孔丘能正视阶级关系变动的这一现实，认识到对“民”的态度如何，是关乎统治是否巩固的问题，因而十分重视“养民”“使民”的问题。

再如子产执政期间，“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论执政”，有人主张毁掉乡校，严禁民众议政。子产不同意，他表示欢迎批评。（见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）对此，孔丘事后也予以赞扬。由此可以看出孔丘思想中某些新的因素。

当然，这并不说明孔丘赞成封建制，而说明他从现状中认识到奴隶制度的某些弊端，企图通过某些改良，补苴罅漏，使已经千疮百孔的奴隶制度得到救治。因而在他一生的政治实践活动中，在某些方面，他的政治措施是可以变通的。如他主张“仁政”，即所谓“王道”，但如王道行不通，也不妨实行一点霸道。因而他赞扬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功绩（见《宪问》、《颜渊》），至于他在一些言论中谈到周礼的损益，更能说明这一点。

三 仕鲁前后

仕鲁是孔丘政治活动的起点。而孔丘当时的社会身分，使他不能厕身鲁国上层社会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，孔丘在母丧期间，听说季氏殯士，便穿着孝服跑了去。季氏家臣阳虎毫不客气地告诉他：“季氏殯士，非敢殯子也。”他只得扫兴而归。过了不几年，大约在二十岁后，他在季氏门下做了委吏、乘田一类的小官（狄子奇《孔子编年》）。委吏，据赵岐说是“主委积仓库之吏”（《史记索隐》），类如今之会计；乘田，就是管理牛羊的小吏。显然，这时孔丘还没有被人们重视。

孔丘正式仕鲁，已经五十一岁了。此前，他已经有丰富的学识积累，和很高的声望了。据载，孔丘幼年，与小儿嬉戏，“常设俎豆，设礼容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年长之后，勤学好问。《论语》中有入太庙“每事问”的记载（见《八佾》）。他自己说：“吾十五有志于学。”（《为政》）既已立“志”，说明他学习的志向比较明确坚定了。至于他学习的内容，当然是奴隶制时代积累下来的丰富文化典籍，包括文物典章制度等。譬如鲁昭

公十七年(公元前525年),邾国国君来朝鲁,宴席间叔孙昭子曾向他请教少昊氏“以鸟名官”的问题。少昊氏是邾国的始祖,所以邾子谈得很详明,“仲尼闻之,见于邾子而学之”。既而告之曰:“天子失官,官在四夷,犹信。”(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)到三十五岁,孔丘的名声已经很大了。孟僖子临终前,嘱咐他的儿子孟懿子,孔丘是“圣人之后”,“年少好礼”,“吾即没,若必师之。”孟僖子死后,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便“往学礼焉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于是,孔丘收了第一批学生,此或为孔丘私人授徒讲学之始。

鲁国自宣公实行“初税亩”之后,以季孙为首的三桓势力控制了鲁国政权。昭公初年,季孙等三家又重新瓜分鲁公室的兵赋军权,鲁君便只有一个空头名义了。季氏三家并不遵循什么“周公之礼”,处处僭越无度,早已君不君、臣不臣了。譬如昭公二十五年(公元前517年),季氏、郈伯因为斗鸡发生矛盾,昭公便想利用郈孙逐季氏,重新夺回政权,结果三家联合,把昭公赶下台,使之流寓于齐国边境。孔丘对季氏的僭越行为,曾表示过愤慨(见《八佾》)。就在昭公失败这一年,大约为了“事君尽礼”并表示对季氏的不满,便离开鲁国,到齐国去寻求从政的机会。

当时的齐国国君齐景公,据说在昭公二十年(公元前522年)曾在鲁国见到过孔丘,谈论过秦穆公称霸的道理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,对孔丘已有所了解。孔丘到了齐国,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,孔丘便答道: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”(《颜渊》)意思是说,君臣父子都应各自做得合乎各自的身分,具有各自应具备的品德。这实际上,与他后来回答子路所说的“必也正名乎”(《子路》)的“正名”,意思是一样的。这一点,

是可以看作孔丘的从政纲领的。因为他所说的“正名”，实质上就是要求恢复奴隶制时代的伦理观念和传统礼制。当时的齐国，也与鲁国遭受着同一命运，景公柔弱，新贵族陈氏早已收买民心（见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），觊觎着齐国政权了。孔丘在齐，据《论语》说，受到季（季孙）、孟（孟孙）之间的礼遇（见《微子》），但却不被任用。据说齐景公曾想把尼谿之田封给孔丘，因晏婴劝阻而未能实现，最后齐景公表示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”，于是，“孔子行”。（《微子》）

孔丘在齐国虽未得仕用，回到鲁国之后，季氏家臣阳虎（又叫阳货）却想利用他的威信，主动劝诱孔丘出仕（见《阳货》）。季氏执鲁国政事，而阳虎又把持着季氏的家政。从后来阳虎企图削除三桓的举动来看，此时他是有取代三桓野心的。孔丘对他只是无可奈何地敷衍了一下，并未认真。这或许为后来取得季氏信任的原因之一。

孔丘反鲁后，十分关心各国政治形势的发展，对各国相继发生的一些变化，都随时进行评论。如晋国的魏献子当政，举贤授能，他称之为“义”（见《孔子家语》）；赵鞅、荀寅铸刑鼎，他评其为“贵贱无序”，是亡国之兆（见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）。同时，他的学识已远近闻名，为各国所重视。如邾隐公向他问冠礼（见《孔子家语》），季桓子“穿井得土缶，中若羊，问仲尼云‘得狗’。”孔丘认为是“土之怪坟羊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；吴国攻伐越国，得骨节专车，派人问孔丘“骨何者为大”，听到他的回答，吴客称其为“圣人”（同上）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于鲁定公九年（公元前501年），孔丘被任命为中都宰，“一年，四方则之”（同上）。因政绩显著，不久便提升为司空，再升为司寇。

孔丘一任司寇，首先便是“正名”。昭公被季氏逐出鲁国，

死于齐境乾侯。归葬鲁国时，季氏又把他暂葬鲁群公墓道之南，以示谴责。孔丘一上台，就按“礼”的规定，迁动灵柩，“沟而合诸墓，”摆正了季氏与鲁公的君臣名分（见《左传·定公二年》）。据《孔子家语》记载，孔丘向季桓子解释说：“贬君以彰己过，非礼也；合之，以掩夫子之不臣。”这说明孔丘对季氏的“不臣”之迹，只是按“礼”“掩”一下，并无大申挾伐之意。事实上，他企图借助这“不臣”的实力，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。

其次，便是取得一次外交斗争的胜利。定公十年（公元前500年），孔丘以相礼资格，参加了齐鲁夹谷之会。据载，齐侯想借盟会之际劫持鲁公，但由于定公听从了孔丘的建议，早有武备，使齐国不敢轻举妄动，而且在会上，孔丘进退以礼，从容的折冲周旋，坚持正确的外交原则，逼使齐侯让步。最后，齐国以归还所侵鲁地郛、汶阳、龟阴之田以谢过，使鲁国全胜而归（见《左传·定公十年》）。通过这次外交斗争，不仅使鲁国的国家地位有所提高，也加强了孔子在鲁国政治中的地位，从而受到季氏三家的尊重。在这一基础上，孔丘利用三家受家臣威胁的时机，向鲁定公讲明“臣无藏甲，大夫毋百雉之城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的道理，提出了“堕三都”的计划。

所谓“三都”，就是三家的采邑，季孙氏在费，叔孙氏在郈，孟叔氏在成。这时三都之宰（家臣）又都控制着三都，对三家构成威胁，因而三家同意孔丘的建议，其实，孔丘表面上是为季氏三家除患，骨子里却是通过堕三都削弱三家的势力而加强公室的力量。孔丘派子路为季氏宰，主持堕三都计划的施行。结果引起三家家臣的激烈反抗，发兵进攻公宫。孔丘保护定公，并命令句须、乐頔率领都城的人进行反击，最后取得了胜利（见《左传·定公十二年》）。虽然由于孟孙氏的家臣公歆

处父的违抗，未能最终完成堕三都的计划，但至少在表面上达到了加强公室的政治目的。

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，在定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96年），曾“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”，以统一舆论。于是，鲁国出现了大治的局面。这是孔丘最得意的时候。

孔丘仕鲁期间，实际上仍是季氏执掌政权。孔丘与季氏的关系，在政治上彼此利用：季氏在家臣闹事、内外不宁的情况下，想借助孔子的威望予以镇抚；孔丘则想借助季氏的实力，施展他的政治抱负。因而，他们之间必然是貌合神离的。因而堕三都之后，孔丘与季氏之间，便不那么融洽了。这就给齐人施展离间之计以可乘之机。

孔丘治鲁，“齐人闻而惧，曰：‘孔子为政必霸，霸则吾地近焉，我为之先并矣’。”于是，齐景公便派黎鉏“选齐国女子好者八十人，皆衣文衣而舞《康乐》，文马三十驷，遗鲁君”。定公与季桓子竟然上了当，因沉溺于女乐而“怠于政事”，“三日不听政”，“郊，又不致膳俎于大夫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孔丘感到鲁君并不真正尊重他，他的政治抱负已很难在鲁国得到施展，于是不得已而率领弟子们离开鲁国，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。

四 周游列国

（一）离鲁适卫

鲁定公十三年（公元前497年），孔丘离开鲁国，首先到了卫国。他曾说：“鲁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（《子路》）鲁、

卫两国是近邻，政事联系也较多。途中，孔丘说：“庶矣哉！”弟子冉有问他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卫国人口既已众多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孔丘说：“富之。”意思是使他们富裕起来。又问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他随即答道：“教之（教育他们）。”（《子路》）可见，孔丘已认识到物质生活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，在其政治实践中是很讲求实际的。他认为“富”是“教”的前提，主张“先富后教”。这一主张，不期然与管仲的主张相合。管仲曾说：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”。（《管子·治国》）被称之为“法家先驱”的管仲，与儒家这位祖师，竟然如此默契，似乎是很奇怪的。其实，孔丘对先代文化政治思想，并没有什么成见，而是“兼收并蓄”，择善而取的。

据说，孔丘到了卫国，卫灵公表面上对他很尊重，并按照其在鲁国的俸禄，“亦致粟六万”。大约卫国当权者害怕灵公重用孔丘，住了不久，便有人说孔丘来卫有野心。卫灵公便派公孙余假加以监视。孔丘怕出什么差错，住了十个月，便离开了卫国（详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

（二）适陈过匡

孔丘离开卫国之后，打算到陈国去，路过匡（在今河南长垣县境），因为给他赶车的弟子颜刻，用马鞭子指着匡城缺口说：“当年我与阳虎便是从这里打进去的。”阳虎在定公六年（公元前504年）曾掠夺和残杀过匡人，而孔丘的相貌又与阳虎有些相似，匡人便误把孔丘认作阳虎，而加以包围、囚禁。弟子们都很害怕，孔丘却很镇静。因为他自信象他这保有历史文化的人，老天是不会轻易让他死掉的。他向弟子们说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；天之未

丧斯文也，匡人其能予何？”（《子罕》）孔老夫子相信老天，大概是自慰慰人之词，似不应强为之词，说是孔丘所谓天命观念云云。后来，匡人解除了误会，就放他们过了匡地。

（三）过蒲返卫

陈国没有去成，孔丘便带领弟子经过蒲（在今河南长垣县境），又回到卫国。卫灵公的夫人南子，听说孔丘来，非要见一见不可，于是发生了“子见南子”的事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对这件事，有十分生动的描述。道学家们为孔丘百般辩解，某些批孔的人，又据此对孔丘大加丑化，因此成为千古讼案。卫灵公年老荒淫，不理政事，宠信年轻的妻子南子，南子便成为卫国最有实权的人。她想见孔丘的动机，今天已难说清，就实际情况而言，一是表明她是卫国的当权者，凡来卫国求仕的人，都应朝见她；一是听说孔丘是一个颇具声望的人，她要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人，似乎并没有别的意图。孔丘是对女人有些成见的人，屡屡辞谢，“不得已而见之。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性情粗豪的子路对此事很不高兴，惹得孔丘发誓赌咒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（《雍也》）其实，孔丘确有难言之隐。这时，他还存有仕卫的希望。他对卫灵公的无道，是早有所了解的。但他认为卫灵公用的一批人还可以有所为（见《宪问》）。见南子，大约与他希望仕卫是有联系的。

孔丘见南子一月之后，灵公与夫人同车出游，让宦者雍渠参乘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过市。他感到十分不堪，感到自己在卫灵公心目之中，还不如一个女人，于是决心离卫他适。

（四）过宋适陈

鲁哀公三年（公元前492年），孔丘带领弟子们从卫国出发，到陈国去。中途要经过曹、郑、宋诸国。据说，孔丘“过曹不容”（《孔子编年》），到了郑国东门，又与弟子相失，郑人说他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，他只得苦笑着说：“而谓似丧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到了宋国境内，孔丘与弟子“习礼大树下”。宋国的司马桓魋想要杀死孔丘，先拔掉大树，以示威胁。孔丘只得离去。弟子们害怕，请求走快一点，他却说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（同上，并见《述而》）遇到不幸，孔老夫子总是请出老天，以增强其自信。

孔丘在这一年终于到了陈国。陈是一个小国，边楚近吴，经常受到大国的侵扰。史传上没有记载孔丘在陈有什么作为，只留下一则陈潁公询问有关考古博物物的传言。

孔丘在陈大约住了三年。这期间，他往来于陈、蔡、叶几个国家之间。有一次吴国伐陈，孔丘师徒困于陈、蔡之间，“不得行，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；孔子讲诵弦歌不衰。”子路不高兴，引出孔丘“君子固穷”的一番议论。据说，子贡到楚求救，楚昭王兴兵往救，才得幸免。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

这期间，孔丘与叶公（沈诸梁）的往还记载较多。据载，叶公是楚国的贤者。楚国侵占了蔡地负函（信阳），便派叶公去镇守。

叶公问政治，孔子答道：“近者悦，远者来。”（《子路》）孔丘回答问题，总是针对问者的具体情况，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。叶公治理叶地，有一批刚刚迁来的蔡人，他希望叶公对他们与楚人一视同仁，都施行“德政”。

有一次，叶公与孔丘谈到一个伦理方面的问题。叶公告诉孔丘，有一个坦白直率的人，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，他便亲自去告发。孔丘便说，正直的人应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。”（《子路》）这一思想的发展，便是为尊者讳，为贤者讳。这是孔丘思想中的糟粕。尽管他在一些场合也曾称赞“不隐于亲”的作法（见《左传·昭公十四年》），但“直在隐中”这一宗法伦理观念，仍对后世造成很坏的影响。

这时孔丘已是六十左右的老人了。有一次，叶公向子路问孔丘的为人，子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。孔丘知道后，便和子路说：你为什么这样说，他的为人是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（《述而》）。

（五）路遇隐者

孔丘师徒在周游列国时，不只受到当权者的冷遇，还受到隐逸者的讥讽、非难。他们在楚国和蔡国境内，便遇到几个隐遁山林的人物。

有一天，楚国的一个狂人接舆，唱着一首歌子，走过孔丘的车旁。歌辞是：“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！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”（《微子》）看来这个人了解孔丘，他为孔丘到处奔波而惋惜，对他不识时务，又微有讥讽。他认为过去的时代不可挽回，未来的也不值得留恋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孔子听后，觉得这不是一个平常的人，想下车与他交谈，但他已很快跑开了。

在回卫国的路上，孔丘派子路去向两个一同耕田的人问渡口。据说，一个叫长沮，一个叫桀溺。长沮问：坐在车子里的是谁？子路告诉他是孔丘。又问：是鲁国的孔丘吗？子路说

是。于是，他说：那他早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。桀溺又问子路是谁，子路说他是孔丘的学生，他便说：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”说完继续耕田。子路跑回去，把这一情景告诉孔丘，触动了孔丘的情怀，很激动地说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（《微子》）他认为逃避现实，遁迹山林，去与鸟兽为伍，是不对的；正因为“天下无道”，才需要人们去改变它，他正是为了把天下引向“正道”，才不辞辛苦，到处奔波的。但是，因为他的努力，是为了维持旧的制度，失败也是必然的。

也是在归卫途中，子路远远落在后面。他遇到一个用拐杖挑着竹筐的老人，便问道：“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？”老人说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谁是你的老师？”说完，就放下拐杖锄草去了，子路只得拱着手恭敬地站在旁边。老人见子路很有礼貌，就留他住宿，杀了鸡，做了饭给子路吃，并将他的两个儿子介绍给子路。第二天，子路赶上孔丘，报告了这回事。孔丘说，这是一位隐士，让子路回去再见见这位老人，但他早已躲开了。子路依照孔丘的意思，和老人的两个儿子说：我老师认为，不出仕，是不合乎“义”的，你既然知道人与人之间长幼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废弃的，那么，君臣之义又怎么能废掉呢？你想要使自身高洁，而却不知这是抛弃了君臣之间这一“大伦”。君子出仕，是为了行义，至于在这个时代“道之不行”，那我们是早就知道了的。（《微子》）这段话，道出了孔丘的苦衷。这位“圣之时者”，不适应那个变动的时代，这他自己是明白的，但他还是努力着。不管孔丘的“道”及其救世济时的愿望，应作如何评价，他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，对后世还是有着良好影响

的。

（六）再次返卫

孔丘从楚国边境再次返卫，是在鲁哀公六年（公元前489年），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。而他的政治信念，似乎也更坚定了。

孔丘离卫期间，卫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卫灵公的太子蒯聩，因为想杀死灵公夫人南子而获罪，出奔晋国（详《左传·定公十四年》）灵公死后，就立蒯聩的儿子辄为卫君（见《左传·哀公二年》）。这一年，蒯聩由晋国的赵鞅以兵力送至戚（卫地）。晋、卫两国世为仇国，卫人因仇恨晋人，也就迁怒于蒯聩，拒绝蒯聩复位。孔丘返卫时，卫国内部父子争夺君位的斗争，刚刚平息，出公辄当政。

孔丘的很多弟子仕于卫，子路便认为出公有请孔丘主持国政的可能。他问孔丘：如果卫君等你治理国家，您首先要干什么？孔丘便说：“必也正名乎？”即是说，首先要端正父子君臣的名分。因为在孔丘看来，儿子逐老子，不正名，是没有办法推行其政治主张的。但如真的“正名”，就把出公的君位“正”掉了，出公那能容得！孔丘的主张，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，所以子路也认为他的看法太迂腐。但是，孔丘却认为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（《子路》）只要他当政，这个“名”非“正”不可。

孔丘的“正名”说，与他向齐景公所说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，完全是一致的。实际上，也就是他“复礼”的“礼”的内容。孔丘把恢复“礼治”当作救世的手段，显然是迂腐而不切合